

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一

為皇后其弟上遺只金步搖毛長詩
燭燿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
皇后入廟先為花勝上為鳳皇以翡
翠為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
鈔曰集本及此者多有作搖者又見

入又燦以灼又翹臣遙反
搖釵也翹舉陸善經曰雙翹花上鸞
鳳雙翼翹然舉今案音決
燿為燦陸善經本搖為華

揮流芳

海外珍藏善本叢書

唐鈔文選集註彙存

曹景行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MAG 24/08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鈔文選集註彙存/()佚名編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

ISBN 7-5325-2681-X

I. 唐... II. 佚... III. 文選—抄本—中國—選集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18806 號

海外珍藏善本叢書

唐鈔文選集註彙存

(全三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69.75 插頁 12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800

ISBN 7-5325-2681-X

I·1370 定價: 380.00 元

前言

周勛初

我國學術界有許多稱「學」的專業，內如「紅學」、「龍學」等，都是近幾十年來才興起的。從過去來說，文學領域中僅有「選學」一目。這就是古今文人至為重視的《文選》之學。劉肅《大唐新語》卷九《著述》曰：

江淮間為《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為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匹。憲以仕隋為秘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還，功竟不就。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上·曹憲傳》中也說「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上·曹憲傳》中也有同樣的記載。這說明唐初「選學」即趨興盛。

其後文士無不重視《文選》。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詩中就曾告誡兒子要「熟精《文選》理」，陸游在《老學庵筆記》卷八中記載當時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可見此書受重視之一斑。

清代《選》學大盛，出現了許多高水平的學術著作，如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八卷，梁章鉅《文選旁證》四十六卷，胡昭煥《文選箋證》三十卷等，都是畢生精力所粹的名著。民國時期，尚有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八卷和黃侃《文選平點》等書，駱鴻凱亦著《文選學》一書，都是很有建樹的《文選》學專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貴族文人作品不受重視，《文選》之學趨衰。「文化大革命」之前，沒有出現過什麼有關《文選》的專著。但當中國步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後，《文選》之學復興，這時大家才有機會向周邊地區環顧，發現國內的《文選》研究在文獻學領域內已趨落後。

日本學者研究《文選》時，憑藉他們在文獻方面的優勢，取得了不少成績。他們擁有許多珍貴的鈔本，其中最為名貴的，即《文選集注》鈔本二十三卷。以斯波六郎博士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這些珍貴的材料，和其他鈔本、刻本作比較研究，對總集本身和諸家注本的內容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得出了許多新的結論，推動了《文選》的研究。現將有關《文選集注》一書的情

況，結合各家的研究成果，介紹如下。

《文選集注》的發現與傳播

澁江全善、森立之於日本孝明天皇安政三年（一八五六）撰《經籍訪古志》，卷六「總類」中首次著錄《文選集注》零本三卷，云是「舊鈔卷子本，賜蘆文庫藏」，提要曰：

見存第五十六、第一百十五、第一百十六，合三卷。每卷首題「文選卷幾」，下記「梁昭明太子撰」及「集注」二字，界長七寸三分，幅九分，每行十一字，注十三、四字。筆迹沈着，墨光如漆，紙帶黃色，質極堅厚。披覽之際，古香襲人，實係七百許年舊鈔。注中引及李善及五臣、陸善經、《音決》、《鈔》諸書，注末往往有今案語，與溫故堂藏舊鈔本標記所引合。就今本考之，是書似分為百二十卷者。但《集注》不知出於何人，或疑皇國紀傳儒流所編著者與？

文中提到的溫故堂藏舊鈔本《文選》零本一卷，《經籍訪古志》上也已著錄，內云「卷中朱墨點校頗密，標記旁注及背記所引，有陸善經、善本、五臣本、《音決》、《鈔》、《集注》諸書及今案語。」可見《文選集注》一書，其時利用的人雖然不太多，但已引起人們注意。

澁江全善、森立之還介紹說此書曾藏金澤稱名寺。後來發現的有些《文選集注》卷子，上面蓋有金澤文庫的印章，可證目下看到的《文選集注》確為金澤文庫舊物。但《經籍訪古志》中也提到，有人曾在稱名寺敗簾中發現此書零片二張，一為第九十四卷，一不知卷第，可見前時此書不太受到重視，已經有嚴重損毀。

光緒、宣統之際（一九〇八年前后），董康赴日訪問，根據澁江全善、森立之書中提示，前往物色，尚得三十二卷。因語內藤虎次郎博士，反映到日本政府，遂得列為國寶（一）。

羅振玉對保存傳播此書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於清末東渡，發現此書後，珍如拱璧，決心保護此書，不讓其湮廢。他請人模寫，加上自己所藏的兩卷，共得殘本十六卷，乃以《唐寫文選集注殘本》為名，輯入《嘉草軒叢書》，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影印行世。其中自藏的第四十八、五十九二卷據原卷影印，其餘均為摹寫之本，而第一百十六卷前半，更據日本某家藏本用小字謄寫，距離原貌更遠（二）。

羅振玉於次年離開日本回國，將京都淨土寺町的一所寓宅捐給京都文科大学，讓出賣後把所得款項作為影印日本所藏中國古寫卷子的費用，並托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兩位博士經辦此事（三）。二人後來編成了一套《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舊鈔本叢書》，《文選集注》列在第三集至第九集，工作始於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後於十七年（一九四二）完成。比起羅氏以前所

印的十六卷，京都帝國大學的影印本在質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因為後者都是依據原書影印的，而且開本寬大，保存原貌，前者則是據之臨摹的，不但字劃失真，而且遇到模糊之處，每逕行略去。因此京都大學影印本出版後，完全可以取代前此的羅振玉十六卷本。

今按此書字大一點五公分見方。正文每行十一字，或十二、三字；注文小字雙行，每行十四至十六字。除八、九二卷出於另一人手外，其他各卷均似出於一人之手，書法秀潤有致。即以書藝而言，亦有觀賞價值。

《文選集注》的編者和年代

《文選集注》一書，我國古代典籍上從無記載，日本文獻中也記載不多，今將一些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略作介紹。

這種集注的體例是怎樣產生的呢？蒧江全善、森立之疑是「皇朝紀傳儒流所編」，意思是說日本古代史官所編，大約史書中有集注的體例，如《史記》有三家注等，所以有此設想的吧。小尾郊一以為「該書和《五經正義》的編撰目的相同。……《文選集注》的編撰，蓋與經書的注疏本相同吧。」（四）屈守元則以為它是「六臣注本」系列的產物，確定它出於南宋書坊大刊「六臣注本」一類本子之後，「是以南宋書坊刻經書的「注疏釋文三合本」，史書的「三家注本」，集部的什麼「千家注」「五百家注本」，這種風氣為其時代背景的。」（五）諸說均有所見，但依其產生的時代而言，則當定為唐代某一《文選》學者參照經史著述中的合本子注體例彙編而成。

按此書徵引的各家《選》注，五臣、陸善經本殿後，時當開元時，故可推斷此書定當編成於玄宗之後。

從避諱的角度來看，《文選集注》遇到高祖李淵、太宗世民之名諱，大半缺筆；而遇中宗李顯、玄宗隆基之名諱，則無一字缺筆；遇宋代諸帝，更無一字缺筆者，可證此書所據之本出於唐代，為唐中期之後的某一唐代《文選》專家所編。其時上距唐初已歷多世，已不避諱。太祖為不祧之祖，固當避諱；太宗功烈輝煌，唐人習慣仍然避諱；故可根據上述避諱現象確定此書編著年代。

又此書每用唐代俗體書寫，如「閉」作「𠔿」，「惡」作「𠔿」等，均與唐代《千祿字書》一書上的記載相合。顏元孫在序中宣稱其著書目的在纂集唐人之俗書，以定正俗，此亦可證《文選集注》當為唐人鈔本（六）。

此書又是什麼時候傳入日本的呢？日本平安朝中期藤原道長撰《御堂關白記》，曾載長保六年有乘方朝臣持集注《文選》與元、白集來。長保六年當宋真宗景德元年（一〇〇四），「集注《文選》」應當就指《文選集注》（七）。凡此均可說明此書原為我國唐人所編，唐末宋初即已傳入日本。還有一些材料可以理解為前此此書已經傳入，但比不上這一記載之確鑿可信（八）。人們目下見到的這一種《文選集注》，到底是傳入的原本呢？還是日本學者據之謄錄之本？大家進而推斷時，一般只能依

據書體和其他類似的書籍產生的年代類推，說法分歧很大。董康以為此書是我國五代時寫本，羅振玉在影印本序中則說：「其寫自海東，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新美寬則認為「就今存大半殘卷觀之，殆屬平安時期末期之書體，無疑也。」〔九〕上述諸說均為推測，難以得出共識。

一九七一年時，臺灣地區的學者邱榮鐸到日本進行學術交流，仔細閱讀《文選集注》，在第六十八卷首頁發現了三方印章，曰「□州田氏藏書之印」，曰「田偉後裔」，曰「審美珍藏」。「□州」當為「荊州」，「荆」字已殘，但從艸從刀，尚可辨識。次頁又有印章四方，曰「七啓齋」，曰「博古□□□」，曰「伏侯在東精力所聚」，曰「景偉庵印」。田偉藏書之處號「博古堂」，有關此名之印章甚為模糊，僅可辨其「專」旁及「古」字。邱氏據此定為宋初藏書家田氏舊藏〔十〕。只是此說仍有可疑。《文選集注》第六十八卷曾為近人田潛收藏，見本書附錄田氏為《文選集注》第七十三卷殘葉所作之題跋。查六十八卷「田偉後裔」一章，鐵綫篆陽文，不類宋代印章風貌。其他印章亦為近代篆刻風格。卷內多處鈐有「潛」、「潛山」小印，此卷末尾尚有一方「潛叟秘笈」的陽文印章，可知卷首數枚亦為田潛之印章，與宋代田偉無涉〔十一〕。田潛，一名吳炤，字潛山，號伏侯，江陵人。兩湖書院學生，光緒戊戌（一八九八）游學日本，壬寅（一九〇二）中舉，乙巳（一九〇五）隨考察政治大臣游歷歐美，均以研究教育為務。曾任留日學生監督，清廷駐日公使館參贊，故得就近購進《文選集注》數卷，從而有「伏侯在東」之說〔十二〕。荊州田氏世為著姓，所以田潛上追田偉一代，作為藏書家的光輝歷史。

由此可知，《文選集注》的編者和寫本年代問題一時尚難得出結論，有待大家作進一步的研究。

《文選集注》中各家注本之介紹

今依《文選集注》中各家注本出現的先後分別作些介紹。

李善注

《文選集注》中注文的編排次序為李善、《鈔》、《音決》、五臣、陸善經等多家注本，這大約是按各家出現的年代先後排列的。各家注後常有編者按語，一一指出文字差異，曰「《鈔》作某」，「《音決》作某」，「五臣作某」，「陸善經作某」之類，但不提「善本作某」，可見正文乃從善本。

有關李善注本與五臣注本的文字異同，很多學者作過比較，尤袤重刻《文選》李善注時，撰有《李善與五臣同異》一卷，附於所刻《文選》之後，而象《文選考異》等書中，更多抉發。但各種李善注本之間，文字亦有異同，則是近代多種本子出現後方才引起人們注意的。《文選集注》中的李善注與傳世各本差別很大，更值得重視。日本學者多人曾將《文選集注》中的李善注與其

他本子中的李善注作比較，常常發現《集注》中的文字獨得其真，由此亦可見其在校勘上有重要價值。

日本學者對於各種李善注本之間的相互關係還作了深入的研究，並開展反覆的討論。斯波六郎的工作極為踏實和細緻，把《文選》研究推進了一大步。他的結論是：「可知此本自李善注本身至類目、篇題、正文，最存李善本之舊。自此本問世，謂之廬山真面乃明，亦非虛言。」（十三）但他在世時，中國北京圖書館藏北宋國子監本李善注與韓國奎章閣藏原出平昌孟氏校正本和天聖年間國子監本的六臣注（十四）等珍貴文獻還未有人介紹，因而有些判斷尚有失誤。

斯波六郎仍然相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說法，以為現行的李善注都是從六臣注本《文選》中分出來的。

中國大陸地區的學者程毅中、白化文考查的北京圖書館所藏北宋國子監本，為現存最早的李善注本，可以推知宋代社會上一直有李善單注本在流傳。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記載他家藏有李善注與五臣注本，唯獨沒有六臣注本，可見他所刻的《文選》並非是從六臣注本中抽出李善注而刻出的（十五）。日本學者岡村繁繼此續作探討，並提出了所謂兩種系統之說，以為「李善注早先是如前述唐（永隆）鈔本一般極為簡素，故後日以這簡素的李善注為底本，分別定立系統，最少也編纂了兩種補訂本李善注：一種是《文選集注》所收的李善注，另一種是宋明刊本為祖本的李善注。二者分別屬於不同的系統。另外李善注的承傳過程，亦不是由完全而走向不完全，以至脫漏的方向，而是由簡素走向煩瑣、增殖的方向。」（十六）森野繁夫則起而維護斯波六郎之說，並作了進一步的論證和推斷，以為「刊本李注是從《集注》本中抽出李注加以修訂再編而成的（十七）。這一問題還在繼續探討之中。」

各國學者通過研究《文選集注》而對李善注增加了很多新的認識，但一時還難以得出共識，這是因為《文選》李善注從問世之日起就出現了很多差異甚大的本子。中唐時期的李匡乂在《資暇集》卷上《非五臣》中說：

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復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

《新唐書·李邕傳》中也說曾經幫助他父親李善補益《選》注。這就是說，李善注《文選》時經歷着一個由簡單到詳細的過程。這或許也只是依據一般常識作出的判斷，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李善在注出了一種詳細注本之後，曾加精簡而產生另一注本。

目下《文選》李善注的各種善本陸續發現，如敦煌卷子中的《文選》零卷、九條家本《文選》二十二卷，以及奎章閣所藏《文選》等。學者還應廣泛占有資料，將各種有價值的注本輾轉互校，而不要停留在抽樣比較的水平上，這樣或許更能揭示李善注的原貌，並說明李善注本幾個系統之間的不同特點。

但在研究李善注時，《文選集注》屬於極爲重要的一種，那是毫無疑問的。通過《集注》中的案語，可以知道目下流傳的《文選》，各種善注刊出時，都已經過後人改動。《文選》尤表本和胡克家本卷四十中均有任彦昇《奏彈劉整》一文，《文選集注》卷七十九亦錄，日本原藏三條家的古鈔本《文選》五臣本和原藏密韻樓的宋刻陳八郎本五臣注上也有著錄。不難發現，諸本差異甚大。根據《文選集注》中的陸善經注與編者案語，可知李善注本正文中原無劉整之嫂的本狀與有關人員供詞中的許多文字，今本李善注將本狀與供詞全部錄入，實乃後來刻印善注的人依傍五臣注而改變舊式。善注本在吏議「整即主」後加注曰：「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參考《文選集注》，可知詳引之文原來放在注內，今本却已歸入正文了（十八）。

《鈔》《音決》

《文選集注》中引用《鈔》與《音決》的地方很多，但不著作者姓名，因此異說很多，應該作些分析。

《文選鈔》和《文選音決》二書，不見我國古代書目，而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都有記載。該書「總集家」中著錄《文選鈔》六十九（公孫羅撰），《文選音決》十（公孫羅撰），列在《文選》六十卷（李善注）後。公孫羅曾和李善一起向曹憲學習《文選》，按《傳》中名字的編排，年歲應當晚於李善（十九）。

公孫羅的注釋，當時雖有名聲，但已遺佚殆盡，僅《唐語林》卷二中有云：

《南都賦》言「春萌夏韭」，子卯之卯也，而公孫羅云：「萌，鳥卵。」非也。且皆言某也，何「卯」忽無言（二十）？

這可能是古籍中僅存的一條公孫羅《文選注》了。《文選集注》中却還保存着公孫羅《文選鈔》和《音決》中的大量文字，豈非《選》學大幸？

但據近人研究，《文選鈔》與《文選音決》中矛盾很多，立論常有不同，決非一人所撰（二一）。有人認爲「《集注》所引《音決》之撰者乃採摭蕭、曹、竇公等，所謂「諸音」彙而定其然否，惟此諸家音中，無一引及公孫羅與李善。《音決》既非許淹音，又非蕭、曹、竇公所撰，由此可證。至於李善注，《集注》本錄於正文下，不與《音決》相次，嘗考善注中所本正文與《音決》所見者頗多互異，則《音決》之書當非李善所撰。其撰者爲較蕭、曹、許、竇稍晚之公孫羅，殆無可疑矣。（二二）」既然《音決》確可證明是公孫羅的作品，那麼與此時有不同的《鈔》當然不可能是公孫羅的著作了。

這一問題尚可深入探討。有關《鈔》與《音決》二書的研究，下面三點似應多加注意。

一、《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上記載得很明確。既然《文選音決》可以證明記載無誤，那麼有關《文選鈔》的記載是否也已增加了可信程度？

二、不論是新、舊《唐書·曹憲傳》中所附李善、公孫羅的傳記，還是《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中有關各家《文選》與《文選音》的記載，還是《文選集注》中有關各家注本的先後排列，都與李善、公孫羅二人的著述年代相合。

三、凡以「鈔」為名的著作，都有「贈錄」、「集納」、「草稿」的意思。今知公孫羅的這兩種著作，都是抄撮他人著述而成，那麼其間出現一些矛盾之處，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又如任彥昇《奏彈劉整》一文中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鈔》在疏證上述兩家時，僅言汜家而不提馬家隻字，亦可見其注釋體例之草率。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著錄的公孫羅《文選鈔》六十九，當即新、舊《唐書》中著錄的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其中多出的九卷或係後人附益的相關文字。《文選音決》當即上述二書中的《文選音義》十卷。公孫羅撰二書之說似不宜輕易否定。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於《文選鈔》六十九（公孫羅撰）之下，尚著錄有「《文選鈔》卅」一書，不知道是上一種書的另一分卷不同的本子呢？還是另一人所撰？如為另一人撰，則與《文選音決》當然會有不同。這些地方還應深入探討。

五臣注

呂延祚在《上集注文選表》中雖然極力貶低李善注的價值，但據歷代學者的研究，五臣注中實際上大量採入了李善注的成果。如果我們再拿《文選集注》中的《鈔》與五臣注作比較，更可發現後者大量吸收前者成果。由此可以勾勒出一條李善注經由《鈔》而發展至五臣注的綫索。目下各種有關五臣的珍貴注本陸續面世，如陳八郎本、三條家本、杭州貓兒橋鍾家刻本，以及奎章閣所藏本等，比類而觀，可以看出《文選集注》中五臣注的特殊地位。因為《集注》成書早，距離五臣成書的年代不遠，應該保留更多原貌。

陸善經注

此書在我國書目中一無記載，唯《玉海》卷五四引《集賢注記》曰：

開元十九年三月，蕭嵩奏王智明、李玄成、陳居注《文選》。先是馮光震奉敕入院校《文選》，上疏以李善舊注不精，請改注。從之。光震自注得數卷。嵩以先代舊業，欲就其功，奏智明等助之。明年五月，令智明、玄成、陸善經專注《文選》，事竟不就。

可知陸善經曾參予蕭嵩領導下的集體注釋工作，但沒有完成。陸善經是開元時期著名的學者。《新唐書·藝文志》中著錄

了他好幾種著作，但沒有有關《文選注》的記載。或許他在參予集體注《選》時家有存稿，後且注完全書，並傳播在外，所以《文選集注》的編者才有可能將之採入。

《文選集注》的價值

由上可知，《文選集注》包容宏富，在文選學、史料學與語言學等領域中都有重要價值。今分別作些介紹。

文選學上的價值

在《文選集注》中，不但保存着內容豐富的公孫羅《文選鈔》和《文選音決》，還有體例謹嚴的陸善經注，這就說明，《集注》中有極為重要的資料，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文選》，還可提供豐富的學術信息。

《文選》中的李善注和五臣注，本身也已成了學術界關注的研究對象。《文選集注》中的李善注與五臣注，與傳世各本都有很多不同，可以作為重要的一種版本而供研究。

李善注有保留古注的做法，如《二京賦》用薛綜注，《子虛》、《上林》二賦用郭璞注等。《文選集注》卷八左太冲《三都賦序》題下陸善經注云：「舊有蔡母遂注」；《蜀都賦》劉淵林注題署下，陸善經注曰：「臧榮緒《晉書》云：『劉逵注《吳》、《蜀》，張載注《魏都》，蔡母遂序注本。』」可知蔡母遂注當時頗為有名（二三）。《隋書·經籍志》中亦有著錄。從這一材料中，也可看出晉人競為《三都賦》作注的盛況。

《文選》中有許多爭辯不休的問題，限於材料，一時難下定論。例如《文選》中的作品，究竟分為幾類？胡克家《文選考異》卷八引陳景雲說，以為其中應有「移」類，這樣全書就得分為三十八類，後人均承其說。而據近人研究，《文選》各種版本中均不見「移」這一文體，李善注等將之合於「書」類，故全書應定為三十七類（二四）。有的學者參考《文選集注》卷八十八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文》中的陸善經注，知《文選》中尚有「難」類，陳八郎本五臣注《文選》中亦有「難」類（二五），因而認為《文選》中的文體實為三十九類。這一問題，目下實難圓滿解決。因為世上已無保留《文選》原貌的本子，大家所能看到的完整本子，只是李善注本、五臣注本、六臣注本等不同系統的差異甚大的各種本子，其中六臣注本乃併合而成，自難據之逆斷蕭統原來的文體分類。三十七類云云，不合傳世《文選》版本的實際；三十九類云云，只是歸納現存各種不同系統的《文選》內出現過的文體而得的總數，無法舉出一種具體的版本證實此說。按宋初編《文苑英華》，本為接續《文選》而作，內分各類文體為三十八類。我國古代典籍的編纂每有陳陳相因之處，據此似可推知，宋初文士看到的《文選》實分三十八類，雖然我們已很難列出其中到底包括了哪一些文體。只是《文苑英華》的編者所能看到的典籍，當有接近李善注、五臣注原貌的本子，也有可能看到保存《文選》

原貌的白文本。因此，今人探究《文選》的文體問題時，似應更多地關注繼之而作的《文苑英華》一書。

史料學上的價值

研究中古時期的文史，常是苦於材料不足。這一時期距離現在已很遙遠，也很難指望會有什麼突然發現。但《文選集注》中却還保存着許多早已被人認為亡佚的材料，人們還未普遍加以發掘。

許詢為東晉名流，交游甚廣，而生平記載不詳。《文選集注》卷六十二「許徵君詢」名下引《文選鈔》曰：「徵為司徒掾，不就，故號徵君。好神仙游，樂隱遁之事。」又引《隱錄》曰：「詢總角奇秀，眾謂神童。隱在會稽幽究山，與謝安、支遁游處，以弋釣嘯咏為事。」《隱錄》亦為佚書，不見古今書目。又《文選集注》卷八十五《奏彈劉整》一首題下引《文選鈔》，轉引《梁典》叙劉整家事；卷八《三都賦序》下《鈔》引王隱《晉書》，叙左思作《三都賦》時「吳事訪於陸機」，都是不見他書的珍貴材料。《文選集注》保存着許多不見其他典籍的重要材料，於此也可見其可貴。

魏晉南北朝時文化極為繁榮，著述繁多。以史書而言，有關著作不下數百種，觀《隋書·經籍志》中的著錄即可知。而自唐初朝廷大規模地修史之後，大批私家著述即告散佚。清代湯球、黃奭等人都曾努力從事輯佚，清理過不少史料，但若與《文選集注》相較，即可了解不少書中均有材料可以補入。即如《文選集注》卷八十五《與嵇茂齊書》作者趙景真名下，《鈔》引干寶《晉紀》叙嵇康與呂安之事甚詳，而湯球之書全然闕如。今人為了發掘材料，競從類書與《三國志》、《世說新語》、《水經注》等書的注中發掘佚文。《文選集注》之中，尤多這類散佚的著作，相信可給學術界平添不少史料。

語言學上的價值

魏晉南北朝時音義之學甚為發達。《新唐書·藝文志》中著錄唐人有關著作甚多，均為集納中古時期語言研究方面的成果而成。但前人研究音義之學，大都只重視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書，這當是歷代王朝首重經書之故。清代以來，也有不少學者注意佛家典籍中的音義著作，如唐釋玄應與慧琳分別著述而名字相同的《一切經音義》、《慧苑的《華嚴音義》等。但有關《文選音義》一類著作，却未引起人們重視，或許因為有關著作大都散佚，材料不易獲得。其實《文選》內容豐富，各類文體中涉及的語言現象極為廣泛，深加發掘，定能有所收穫。《文選集注》中有公孫羅《文選音決》一書，內有包括蕭該《文選音》一書在內的許多寶貴材料，人們加以研究，定會對中古時期的語言現象和文學現象增進認識。

總的來說，《文選集注》一書在文選學、史料學與語言學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亟應引起人們的注意。

餘論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此書時，時值戰爭時期，流布不廣，中國學者難以看到此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文化交流之事不暢，《文選》資料更難顧及。直到中國步入改革開放新階段，學界中人環顧其他地方學術研究情況，方有借鑒國外學者研究成果的要求。但《文選集注》篇幅鉅大，定價昂貴，各地學者難以購買，大家這才感到有重印該書的必要。

我在一九九四年赴日本國立奈良女子大學講學期間，得到許多朋友的幫助，複印了《文選集注》一套，藉供研究。鑒於此書具有很高的價值，學術界渴望見到此書，於是我又與上海古籍出版社聯繫，得到他們的支持，決定重印此書，將此珍貴文獻迎歸故土。為此我又力所能及地徵集一些新的材料，務使此書更為完整。當年羅振玉影印此書時，尚有海鹽張氏所藏二卷、楚中楊氏一卷未曾印入，今得台灣漢學研究中心提供膠卷，印入《文選集注》第九十八卷，當是海鹽張氏遺物。又得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所藏周叔弢捐獻的《文選集注》第四十八卷（二六），并入原京都帝國大學影印本後，此卷已近完帙。又京都帝國大學影印本第七十三卷中原缺二頁，今得北京圖書館幫助，提供殘頁膠卷，恰好可以補足。同書第六十一卷江文通《雜體詩》潘黃門《悼亡》中原缺二十五行，經日本國立奈良女子大學橫山弘教授聯繫，得到日本御茶之水圖書館成實堂文庫支持，提供殘頁照片，此詩始告完整。估計此書零頁尚有殘存，但多保存在私人手中，一時難以求得，目下只有以此付印了。與前相比，此書已經有所增益，比之羅氏印本，非但在卷帙上有增加，而且在質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即與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本相比，也已增加不少篇幅。近於完整的卷子，即有九十八與四十八二卷，因此，目下存世的《文選集注》，已有二十四卷。

從此書的複印到公開出版，都曾得到國內外許多朋友，如興膳宏、橫山弘、金子和正、大平幸代、劉顯叔、盧錦堂、陳尚君、程有慶、杜澤遜、傅剛等先生，在各個階段或某一環節上給我很大的幫助。陳尚君先生還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委托，擔任此書的具體編纂工作。內藤、狩野兩位博士向原藏《文選集注》殘卷的藏書家或藏書單位求得原書或底片後，即按原樣印入。因此，京都大學影印本的序次前後重出或顛倒的很多，不便使用。陳尚君先生悉依《文選》原來的序次重行編定，且擬篇名目錄，以利閱讀。責任編輯周小虹女士又作了細緻的加工，凡此均請接受我誠摯的謝意。

一九九八年六月識於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注釋】

（一）董康《書船庸譚》卷八下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五月十三日記云：「小林詢大坂某會社屬介紹收購上海某君所藏《文選

集注》之結果。《文選集注》者，吾國五代時寫本，除六臣外，兼及曹憲等注，即六臣注亦較通行本爲長。以分卷計之，當有一百廿卷。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言金澤稱名寺藏有零本。余於光、宣之際，偕島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語內藤博士，白諸政府，列入國寶。時吾國公使署田參贊購得殘本數卷，余從田君收得諫詞一卷。田君歸國後悉鬻之於廠肆正文齋；今某君所藏，即從正文齋購之也。甲寅歲，余因迎玉姬，無資備辦奩具，乃翻《靜志居詩話》朱吉以美婢易袁宏《後漢書》故事，割讓於津門某氏。嗣廠友張月巖得此卷，以萬元鉅值鬻於勝山，藝林共知其事，以故某君未允賤售。『勝山即日人勝山岳陽。』

〔二〕臺灣大通書局於一九七二年印行《羅雪堂先生全集》，《文選集注》一書於原十六卷外又多出數卷，想是後來陸續所得，而生前未及印行。

〔三〕日本新美寬《新獲文選集注斷簡》：『使《文選集注》廣爲流傳者，實應歸功羅叔言翁。……翁辛亥革命間來日，卜居京都市淨土寺町，歸國之際，舉其寓宅所得，捐贈以爲東海舊鈔本《文選集注》印行之資。以此托君山、湖南兩先生。』載《東方學報》第八冊，京都，一九三七年十月。參看甘孺（羅繼祖）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錄（羅振玉年譜）》（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條，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四〕《譯注文選·解說》，載《全釋漢文體系》第三十六冊，集英社一九七四年版。

〔五〕《文選導讀》第五《文選流傳諸本述略》（五）集注一百二十卷本，巴蜀書社一九九三年版。

〔六〕邱榮鐸於《文選集注所引文選鈔研究》和《唐寫本文選集注第九十八卷跋》等文中都曾作過詳細論證，載中國文化學院夜中文系文學叢書第一種邱榮鐸著《文選集注研究》，一九七八年十月。

〔七〕斯波六郎《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第二部分『舊鈔《文選集注》殘卷』於此持謹慎態度。因爲中國五臣注《文選》也稱五臣『集注《文選》』，故而認爲尚待進一步查考。文載《文選索引》卷首，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五九年版。小尾郊一《譯注文選·解說》則據《御堂關白記》寬弘三年（一〇〇六）十月二十日條下有『五臣注《文選》、文集等持來』等語，以爲一人同書所載而用詞有異，五臣注《文選》與集注《文選》明係兩種不同書籍，集注《文選》當即《文選集注》。花房英樹《關於文選第九十八卷》中也以爲道長一共用了三個名詞，集注文選、『五臣注文選』與『摺本文選』，三者自然有別。『摺本文選』指『版本文選』。文載《小尾博士退休紀念中國文學論集》，第一學習社一九七六年版。

〔八〕日本天曆二年，當我國五代後漢乾祐元年（九四八），藤原良秀讀《後漢書·揚雄傳》中的《甘泉賦》時，已於『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鈞陳使當兵』句旁加注時引《文選集注》中語。花房英樹據此撰文，以爲《文選集注》此書已在此前傳入日本，見《關於文選第九十八卷》。

〔九〕見《新獲文選集注斷簡》。日本學者見解大體相同，唯在年代上尚有早、中、晚不同時期之說。

〔十〕參見邱榮鐸《今存日本之〈文選集注〉殘卷爲中土唐寫舊藏本》一文。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衢州本）卷九，書目類載《田氏書目》六卷，提要曰：「右皇朝田鎬撰。田偉居荆南，家藏書幾三萬卷。鎬，偉之子也，因成此目。元祐中，袁默爲之序。」葉昌諤《藏書紀事詩》卷一引《紫桃軒雜綴》：「《荆州府志》載：『宋田偉，燕人，爲江陵尉，因家焉。作博古堂，藏書三萬七千卷。』又引《輿地紀勝》：『田偉藏書三萬七千卷，無重複者。』王欣夫補正引謝肇淛《五雜俎》：「……又有田偉者，爲江陵尉，作博古堂，藏書至五萬七千餘卷。」見《藏書紀事詩》（附補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參看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二《北宋承平時期的藏書家》田偉部分，臺灣學海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四月版。

〔十一〕「荆州田氏藏書之印」與有關「博古堂」的兩方印章最爲可疑。田潛於清宣統庚戌（一九一〇）從日本購得日正平間刻本《論語集解》十卷，亦曾蓋有「有宋荆州田氏七萬五千卷堂」、「荆州田氏藏書」、「景偉慶印」、「後博古堂所藏善本」、「潛山讀本」、「田偉後裔」、「伏侯得之日本」諸印，似可推知上述二章當爲同一性質之印章。參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經部·八·四書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又上述「田氏七萬五千卷堂」云云，顯爲後人的虛構誇飾之詞。

〔十二〕參看注〔一〕和潘重規《日本藏〈文選集注殘卷〉綴語》一文。

〔十三〕《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

〔十四〕韓國金學主《朝鮮時代所印文選本》，載《韓國學報》第五輯，一九八五年。

〔十五〕程毅中、白化文《略談李善注〈文選〉的尤刻本》，載《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十一期。

〔十六〕《文選集注與宋明版本的李善注》，載《加賀博士退官紀念中國文史哲學論集》，日本講談社一九七九年版。

〔十七〕《關於〈文選〉李善注》，載《日本中國學會報》第三十一集，一九七九年。

〔十八〕參看拙撰《〈文選〉所載〈奏彈劉整〉一文諸注本之分析》，載《文學遺產》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十九〕《舊唐書·曹憲傳》附李善傳，云是「明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又附公孫羅傳，云是「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按李、公孫二人仕履而言，李善亦應比公孫羅年長得多。

〔二十〕此文當出《劉賓客嘉話錄》。今本《劉賓客嘉話錄》佚，唐蘭援此入校輯本《補遺》，且云首句當作「春茆」音子卯之卯也。此字，爲「茆」字作音耳。后人既增「夏韭」二字，遂以「音」字爲誤而刪之。然《南都賦》自云「春卯夏笋，秋韭冬菁」，不云「夏韭」也。見《劉賓客嘉話錄》的校輯與辨偽，載《文史》第四輯，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六月。參看拙撰《唐語林校

證》卷二該條，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

〔二一〕 斯波六郎《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

〔二二〕 邱榮錫《文選集注所引文選鈔研究》。

〔二三〕 參看羅國威《左思〈三都賦〉綦毋邃注發覆》，載中國文選學研究會、鄭州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文選學新論》，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二四〕 穆克宏《蕭統〈文選〉三題》，載《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後收入《滴石軒文存》，海峽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按此說立論的前提是以爲《文選》各種本子均無「移」體，實則日本古鈔白文無注本中單列「移」體；古代刊本中，如陳八郎刻五臣注本、朝鮮正德四年刻五臣注本與汲古閣刻李善注本亦有「移」體。前時學者所見版本不多，故《考異》中有「諸本皆脫」之說，今人自不能據之作進一步的推論，以爲傳世的各種《文選》本子中均無「移」體。

〔二五〕 傅剛《〈文選〉版本叙錄》，載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國學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四月版；游志誠《論〈文選〉之難體》，載《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二輯），臺灣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二六〕 此卷軸之標籤上題「唐寫文選殘卷」，下爲雙行小字「日本國寶金澤文庫舊藏／宣統庚戌伏侯所收并記」，可知此爲田潛從日本購得而流出者。

古今圖書集成
卷八

目 錄

前 言.....周勛初 一

卷八

京都八

左太冲蜀都賦一首.....一·一

卷九

京都九

左太冲吳都賦一首.....一·八

卷四三

詩

招隱.....一·二二〇

卷四七

詩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一·二二一

曹子建贈丁儀一首.....一·二二三